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 及其当代启示

■ 陈洪玲 衣鸿飞

(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1)

【摘要】做好青年工作,事关党的事业薪火相传,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团结青年、教育青年和动员青年的过程中,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与加强青年组织建设相结合、坚持关心爱护青年与创新工作方法相结合、坚持学习革命理论与参加生产劳动相结合、坚持投身革命实践与深入工农群众相结合,不断探索前进,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青年工作经验,为新时代党的青年工作提供了借鉴和启示。新时代,青年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青年组织建设;不断创新工作方法,满足青年切实需求;加强对青年的教育培养,坚定青年理想信念;重视社会实践锻炼,坚持群众路线。

【关键词】延安时期 中国共产党 青年工作 青年运动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24.04.008

青年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最活跃力量。重视青年工作和青年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奋斗历程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广大青年在革命运动中的重要作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尤其是延安青年运动实际相结合,推动青年运动始终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同频共振。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需要充分发挥青年的生力军作用。新时代的青年工作应该从延安时期党领导青年工作和青年运动的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把握工作规律,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找准定位,团结带领广大青年把忠诚写在党和人民事业中,把青春播撒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

收稿日期:2024-05-17

作者简介:陈洪玲,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主要研究中共党史党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

衣鸿飞,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中共党史党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深化对‘五个必由之路’规律性认识研究”(课题编号:23ZDA135)的阶段研究成果。

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青年工作的时代背景

青年作为推动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的“种子”和“希望”。延安时期,面对严峻的党内外斗争和局部执政考验,中国共产党始终立足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来部署和推进青年工作。这既是基于革命斗争和组织建设的需要,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所进行的战略考量。

(一)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和根据地需要不断发展

1931年1月,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由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内的影响,致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在冲破国民党重重围堵和长达二万五千里的漫漫征途中,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损失惨重,“全国红军人数由最高时的30万人减少到长征结束时不足3万人”^[1],先前建立的根据地也几经敌人破坏,规模逐渐缩小。另外,军队中的老兵数量不断减少,新兵的补充速度越来越无法满足战争的需求,致使军队战斗力下降、士气低落,壮大革命力量成为当务之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在新的大革命中,只有“巩固与扩大我们的组织;动员大批青年到政府机关及军队中去”^[2],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彻底的胜利。

抗日战争决定着中华民族的命运,也决定着全体青年的命运。每个忠心救国的青年,投入保卫祖国和人民的事业中去,这不仅是每个青年的责任,而且是最光荣的任务。从这一形势出发,中国共产党青年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动员青年参加抗战队伍。“同时我们更应该了解,我们虽然已经作了不少的宣传鼓动工作”^[3],但青年参战人数仍然十分有限,还不能形成一个全国性运动。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根据以往青年工作的经验教训而提出新的适合发展形势的青年工作方针,以动员和组织千百万的青年参军入伍,投身根据地建设,走上抗日救国、民族解放的战场。

(二)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需要不断扩大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全国的党员只有4万余人,“其中大部分党员又集中在军队中”^[4],这与党所肩负的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历史重任是极不相适应的。因此,为了完成中国共产党在伟大历史时期所担负的神圣任务,必须扩大党员队伍,巩固和加强党的建设。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指出,一方面,有“大批的革命分子要求入党,这给了我们发展党以极端有利的条件”^[5];另一方面,建立“强大的党的组织是必要的。但应该指出,目前党的组织力量还远在党的政治影响之后,甚至许多重要的地区,尚无党的组织,或非常狭小”^[6]。因此,“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当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7],并且,要“在后方无党的组织的地区,当地党应有计划的与迅速的去重新建立与发展党的组织”^[8]。

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抗日前线和迅速扩大的根据地迫切需要大批干部。遵义会议之前,中国共产党一直没有形成完整、系统的干部制度,一些表现积极的青年同志还没来得及培养就牺牲了,干部队伍规模一直没有得到及时扩充,严重阻碍了革命事业的发展。1935年12月,

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会议,从时局和党肩负的历史任务出发,强调“党要有成千上万的新干部”,“没有很多的与很好的干部作枢纽,是不能成功的”^[9]。为此,必须“大胆使用知识青年充任青年工作干部”“提拔现有青年干部中优秀及工作成绩优良的分子”^[10],以壮大党的干部队伍,为夺取抗战胜利奠定干部保障。

(三)青年运动中的错误倾向和错误思想需要纠正

1937年1月,此时党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和动员广大爱国人士为抗战救国而斗争,党的青年工作也都应当以此为中心。但是,在青年工作开展过程中,出现了“忽视整个抗日斗争的实际需要和全体农民共同要求,片面强调青年的特殊利益,孤立地解决青年的特殊问题”^[11]的“青年主义偏向”。一些青年干部不懂得“解决青年本身的特殊任务和担负抗日救国的一般任务,正是现在青年运动不可偏废的两翼,二者是相成而不是相反的”^[12],而是过分强调青年组织的独立性和青年工作的特殊性,把广大青年从各方面和各条战线上抽调出来独立组织文化教育活动,从而使青年运动置于整个革命运动之外,严重影响党领导的整个抗日救亡运动。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及时纠正青年运动中的青年主义偏向,不断改造青年组织,在抗日的号召下团结最广大的青年群众。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的抗日救国主张深深影响了广大青年,延安迅速成为一大批抗日青年的汇合地,“仅在抗战爆发后的两年间,延安就接纳了三四万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13]。这些人有一定的政治觉悟、革命理想和学习热情,“大多数本质是很好的,但世界观基本未改造,带来了某些非无产阶级思想,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思想”^[14]。具体表现为“自高自大自满自足,不和群众打成一片”^[15]。这既给党的青年工作带来严峻挑战,阻碍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也使青年自身无法铸就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斗争到底的气魄与气节。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认为,遵义会议虽然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但“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16]，“它们还在经常作怪,还在袭击我们”^[17],这些不良作风传播开来,会害了广大青年。因此,全党迫切需要在广大青年中间进行系统的统一战线教育和正确的政治理论教育,彻底肃清一切影响青年成长和发展的非无产阶级思想,重塑青年灵魂、再造青年世界观。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青年工作的具体实践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积极探索符合时代和青年特点的工作方法,逐步形成了以组织建设为根本、以关心爱护青年为基础、以学习教育为重点、以投身革命实践为抓手的青年工作方针。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和帮助下,广大青年逐步克服自身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逐渐实现从“旧我”到“新我”的转变,走上了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正确道路,成为无产阶级的新型革命青年。

(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与青年组织建设相结合,强化青年工作的组织保障

时局的变化决定着青年运动的方向。为了加强党对青年工作和青年运动的领导,动员广大青年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指出:“共产党应

是青年运动的唯一领导者”^[18]，“在共产党各级组织应该有青年部或青年委员会及青年干事，在各级党部总的领导下，担任青年运动的工作”^[19]，要把青年团改造成为“广大群众的非党的青年组织”^[20]。根据中央这一决定，1937年4月，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在延安成立。此后，共青团中央停止工作，党开始以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的名义组织和领导青年运动。7月，中共中央设立青年部，以指导全国的青年运动。随后，各地共青团也相继进行了改造，成立各级青年救国会（以下简称“青救会”）。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的成立，标志着西北地区青年抗日救亡运动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实现了先进青年的共产主义组织向各党派各阶层青年群众的统一战线组织的转变。

自共青团改造后，为发展全国青年运动、集中统一党领导下的各青年团体，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青年工作委员会的决定》，要求“县委以上地方党部直至中央，成立青年工作委员会”，“并在同级党部领导之下”^[21]。随即，中共中央成立了以陈云为书记、冯文彬为副书记的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央青委”）。中央青委成立后，为促进各青年团体的交流和联系，推动全国青年运动的统一和全国青年的团结，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选举成立了中华青年救国团体联合办事处，作为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领导机关。此后，中央青委、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中华青年救国团体联合办事处合署办公，形成了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三位一体”的青年工作格局。这既保证了党对青年运动的直接领导，又能在根据地、国统区等不同地区、范围、活动中，灵活地选择合适的青年组织名称，最大限度地发挥了青年组织指导青年工作的作用，推动了青年运动更加广泛和深入地发展。在全面抗战爆发的两年之中，仅陕甘宁边区的青救会成员，“经过动员到前线的已有两万多人”^[22]。

抗战胜利后，随着革命形势和任务的变化，青救会已不能适应青年运动的发展，不能满足久经考验的青年们在政治上进步的需要。因此，在1946年8到9月间，中共中央两次召开会议讨论建团问题^①，“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均赞同建立青年团，并提出进行重建青年团的试点工作”^[23]。1946年1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议》，要求“此组织应比过去共产青年团^②更群众化、青年化，政治上接受共产党领导”^[24]。随之中央青委在延安地区开展建团试验，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农村团组织——冯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支部；第一个工厂团组织——丰足火柴厂“毛泽东青年团”支部；第一个学校团组织——“延安行知中学毛泽东青年团”总支。到1948年底，试建青年团的工作在各解放区普遍开展，为中共中央正式建团提供了经验借鉴。

（二）坚持关心爱护青年与创新工作方法相结合，创造青年学习生活的良好环境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青年的关心爱护始终贯穿于青年工作和青年运动的全过程。在中央青委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青年救国联合会（以下简称“边区青救会”）发动青年开展争取切身利益、改善生活待遇的斗争，解决包办买卖婚姻、童养媳等封建束缚问题，为广大青年学习和生活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① 1946年8月26日，任弼时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座谈会讨论建团问题。1946年9月13日，任弼时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座谈会讨论建团问题。

^② 1922年5月，团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正式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1月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为了把来延安的青年都接收下来,给他们提供一个学习真理的场所,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先后在延安及周边地区创办了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等30余所干部学校,“开学典礼不断、结业歌声不绝的景象使得延安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学城”^[25]。这些学校的创办不仅为来到延安的广大青年提供了学习生活的场所,而且从学校毕业的青年也极大满足了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型干部的需求。另外,中共中央更是尽可能地为这些学校配备阵容强大的干部教员队伍,“当时青年们约请中共领导人讲课、题词,基本上是凡请必到”^[26],“毛泽东在1938年和1939年两年中,给抗大教职员讲话就达28次之多,倾注了他对抗大青年的厚爱”^[27]。朱德、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也多次到学校演讲,指导延安青年的成长和青年运动的发展。

为了更好地教育和锻炼青年,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以乡青救会为基层单位,采取俱乐部的组织形式,向青年进行抗日救国的政治教育。通过短期培训、召开座谈会和组织演讲比赛等方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同时在《新中华报》上开辟“青年呼声”栏目,及时反映边区青年的活动和青救会的工作情况;成立“延安青年剧团”“抗战文艺工作团”“鲁迅研究会”等,帮助和引导青年进行社会实践。此外,陕甘宁边区青救会还多次组织青年巡视团和调查团等,长期深入乡村,调查研究各种有关青年工作的情况,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总结经验,有效保证了各地青年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广大青年加深了对边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深入了解,增强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本领,为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坚持学习革命理论与参加生产劳动相结合,明确青年教育的基本内容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教育青年和培养青年过程中,坚持把学习革命理论与参加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青年教育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党领导青年运动应对客观形势的内在需要。为了培养革命事业所需要的干部人才,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先后创立许多具有干部培训性质的学校。例如,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以培养军事人才为主;陕北公学以培养行政、民运干部为主;毛泽东等还发起创办了以培养抗战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为主的鲁迅艺术学院等。这些创办于抗战初期的学校,主要是进行干部短期培训,学期一般是三到六个月,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逐步向正规学校过渡。此外,在延安的学校,学习是压倒一切的任务,边区青救会专门作出决定,将各区县尤其是偏僻地区工作时间较长的青年干部抽调到延安进行理论学习。经过系统的革命理论学习,青年们对马列主义有了初步认识,坚定了他们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多数人从一个抗日的热血青年迅速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1940年到1941年,由于国民党停发军饷和对边区的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发生了空前的财政危机。面对“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28]的选择,毛泽东明确提出了“自给自足”的奋斗目标。边区机关、学校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号召,投身大生产运动,“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生产”^[29]。任弼时在指导西北局工作时指出:“发展生产是我们今天全部工作的中心环节。”^[30]在中共中央财政工作总方针的指引下,其教育政策也呈现出理论学习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特点。例如,绥德县提出了“学校和劳动、社会、政府、家庭结合”^[31]的方针,延

安市完小“鼓励学生回家后帮助家庭工作,做到教学与生产相结合、与政治相结合”^[32]。陕甘宁边区学校的师生,依靠自己动手、艰苦奋斗,在生产自给丰衣足食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全边区机关学校达到了粮食自给15%、30%以至40%不等;蔬菜接近全部自给”^[33]。毛泽东对此高度评价道:“他们在实行生产运动,开荒种地这件事,连孔夫子也没有做过。”^[34]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革命理论学习和参加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不仅减轻了边区政府和群众的经济负担,使青年们在思想品德上拉近了与工农群众的距离,而且增强了青年对革命理论的理解,锻炼了青年自身的劳动技能和自强不息的意志品质。

(四)坚持投身革命实践与深入工农群众相结合,锚定青年运动的目标导向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动员广大青年积极投身革命运动、支援抗日前线的时候,也号召青年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深入下去,和广大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发挥其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精神”^[35]。毛泽东认为,“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36]。在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的毕业典礼上,毛泽东也多次寄语学员,“社会是学校,一切在工作中学习”^[37],“同志们拿到的只是开抗日之门的毕业证书,今天在小抗大毕业,明天还要到大抗大学习,要拜人民为师,认真读读社会、实践这本‘无字天书’”^[38]。在国统区,周恩来应武汉大学邀请,向全校师生作了题为“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的演讲,号召青年们到军队里去,到战地服务去,到乡村去,到被敌人占领了的地方去,开展抗日斗争^[39]。

在党中央直接领导和关怀下,经过陕甘宁边区青救会的努力,不仅及时纠正了延安青年运动的青年主义偏向,推动了青年运动与整个革命运动的紧密结合,而且使青年在边区教育、减租减息和民主政权建设等各项革命斗争中做出了更大的成绩。在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的号召和动员下,延安青年通过帮助边区政府发展农村小学和社会教育运动,不仅扫除了青年队伍里的文盲,而且推动了整个边区群众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成为政府在这一工作中的第一助手”^[40]。在边区青救会的领导下,延安青年积极向农民群众宣传党和政府关于减租减息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办法,并和广大农民群众一起同地主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在每次普选活动中,各级青救会、学生会等都组织选举工作团、宣传队、秧歌队、话剧团等到工厂、农村进行广泛的宣传活动,帮助工农群众开展选举工作”^[41],逐渐成为边区减租减息和民主政权建设运动中一支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毛泽东盛赞道:“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延安的青年运动的方向,就是全国的青年运动的方向。”^[42]在延安的青年运动的影响下,国统区的“青年文化工作者组成各种形式的演剧队,运用街头剧、活报剧等形式,到处广泛宣传抗日”^[43],起到了动员底层群众、振奋民族精神的积极作用。

抗战胜利后,为粉碎国民党反动集团“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各行各业的青年在党的号召下,积极行动起来,到前线去,到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1945年8月24日,在延安交际处欢送会上,中共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彭真强调,文艺要“反映当地群众的生活,而不是把延安的一套硬搬出去”^[44],要求文艺工作者“应深入群众,准备到大城市的工厂、贫民区、矿山去”^[45]。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引领下,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从全国各地出发,奔赴斗争最前线,直接参加了新解放区的革命斗争和建设,深深影响和鼓舞了新解放区的青年,为中国人

民解放事业和建立新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青年工作的当代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46]，并对广大青年提出了“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47]的重要要求，为新征程上开展青年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青年工作和青年运动有效地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青年成为革命斗争的重要生力军，其宝贵的实践经验为新时代党的青年工作提供了有益借鉴和启示。

（一）新时代青年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青年组织建设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青年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的根本保证，青年组织建设是党领导青年工作的重要基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围绕党在各阶段的中心任务，及时调整青年组织建设的方针，保证了青年工作和青年运动的正确方向。新时代青年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牢新时代青年工作和青年运动的正确航向。

新时代的青年工作要把党的领导全面、系统地贯穿于青年组织建设的全过程，进一步加强完善青年组织建设。一是坚持党建带团建，铸牢对党忠诚的政治灵魂。共青团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断加强团的政治建设，对标全面从严治党的经验做法，深入推进团的自我革命，把“党旗所指就是团旗所向”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此外，共青团要锚定党的二十大确定的目标任务，以激发新时代青年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挺膺担当为主线，以全面加强共青团和团干部队伍建设为路径，积极推动构建“凝聚青年、服务大局、当好桥梁、从严治团”的工作格局。二是着力强化思想引领，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青年头脑。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将青年工作深度融入学校“大思政”格局，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充分发挥共青团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主力军作用，坚持组织化教育、青年化阐释、分众化引领、网络化传播，帮助青年更好地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引导广大青年不断深化对“两个确立”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不断增强做到“两个维护”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三是根据新时代青年工作的特点，积极推动团组织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共青团来说，建设什么样的青年组织、怎样建设青年组织是事关根本的重大问题。”^[48]因此，新时代的青年工作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道路，着力加强青年干部的教育培养，探索基层团组织建设新思路和新模式；充分发挥团组织体系优势和网络新媒体优势，以团支部为基本单位，持续开展“青年大学习”主题团课，不断强化和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穿透力与覆盖面；统筹校内外资源，加强校地共建、区域联建，拓展更具实践特色和社会广度的项目，推动共青团实现从“组织起来”到“引领起来”的转变。

（二）新时代青年工作必须不断创新工作方法，满足青年现实需求

做好青年工作，促进青年更好发展，是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工程，而重视青年工作的方式方法创新是建设好这项工程的重要一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关心和支持青年是全

社会的共同责任”^[49],要“千方百计为青年排忧解难。”^[50]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青年工作过程中,既注重青年的物质利益、又注重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来教育和动员青年。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时青年的现实需求,也推动了陕甘宁边区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发展。

新时代青年工作应顺应时代潮流,紧扣新时代青年成长成才的发展需求,不断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把工作延伸到青年最需要的地方去。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社会生活的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各种信息在人们的生活中相互交融,对广大青年的学习、生活和工作方式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做好新时代党的青年工作,要善于与新媒体技术快速发展视域下的青年需求结合起来,运用互联网思维和信息化手段开展青年教育、青年服务、青年学习和青年交流,推进“互联网+”背景下青年工作的高质量发展。

做好新时代党的青年工作应充分发挥共青团组织联系青年、服务青年、凝聚青年的优势和作用,“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51]。同时,共青团应把“以青年为本”作为开展一切青年工作的基本原则,“青年在哪里,团组织就建在哪里;青年有什么需求,团组织就要开展有针对性的工作”^[52]。在制定政策和计划时,充分考虑不同年龄阶段和不同地区青年的不同需求,把青年的感受如实向党报告,把党的温暖充分传递给青年,让青年在鼓励中坚定信心、在关爱中奋力前行。

(三)新时代青年工作必须加强对青年教育培养,坚定青年理想信念

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既是教育的根本问题,也是新时代青年工作的战略课题和目标指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青年一代培养造就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任务,是全党的共同政治责任。”^[5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办学治学过程中坚持理论学习和劳动教育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既注重对青年的理论武装又重视对青年的实践历练,为根据地建设、抗战胜利和民族解放培养了大批理想信念坚定、革命精神高昂的优秀青年。因此,新时代的青年工作也应加强对青年的教育培养,引导广大青年在“学思践悟行”中坚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终身的理想信念。

心有所信,方能行远。新时代的学校教育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围绕党在新时代的教育方针进行改革创新。一方面,学校思政教育必须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和学生成长成才规律,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不断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不断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将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入学校德育工作,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使之之内化为青年学子的精神追求,外化为青年学子的自觉行动。另一方面,学校应秉持以师德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结构合理的原则,努力建设一支政治过硬、品德高尚、业务精湛的新时代高素质教师队伍,为培养理想信念坚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保驾护航。

(四)新时代青年工作必须重视社会实践锻炼,坚持群众路线

向人民群众学习,在火热实践中成长,是中国共产党对青年的一贯要求,也是青年成长成

才的科学路径。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青年工作中十分注重引导青年在革命实践中锻炼自己和服务群众,这不仅丰富了延安青年的思想世界,而且也培养了他们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情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关心广大青年成长成才。他指出:“青年人要成长为堪当大任的人才,必须经过一番艰苦磨练”,“我们党从来都是在重大政治任务中、在火热社会实践中锻炼干部、培养干部的。”^[54]新时代的青年工作要自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践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并结合新时代青年的思想特点和群体特征,引领广大青年树立高尚情操,自觉走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做根在基层、心系人民的新时代有为青年。

始终保持与祖国同向、与人民并肩是青年成长成才的法宝,也是当下开展青年工作的重要遵循。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青年工作过程中鼓励和号召广大青年投身到大生产运动、整风运动和“三三制”政权建设等革命实践中去,不仅使他们了解和掌握了边区情况,而且也培养了青年的群众观点和实践精神。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阶段,广大青年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导,“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用眼睛发现中国精神,用耳朵倾听人民呼声,用内心感应时代脉搏,把对祖国血浓于水、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感贯穿学业全过程、融汇在事业追求中”^[55],让青春在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中绽放绚丽光彩。

结语:时代各有不同,青春一脉相承。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中国的青年运动有很好的革命传统,这个传统就是‘永久奋斗’。”^[5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青年奋斗精神和奋斗本领的培养并强调,“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行动是青年最有效的磨砺”^[57],“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58]。因此,新时代的青年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脚踏实地、求真务实,在学习工作中增长才干、练就本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勇立潮头、奋斗担当,继续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新的青春业绩。

[参 考 文 献]

- [1]高九江 韩琳:《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3页。
- [2][3][10][15]共青团中央青运史工作指导委员会:《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十四集),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172、126、153、227页。
- [4]梁星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71页。
- [5][6][7][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选集》(第十一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66、467、467、467页。
-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50页。
- [11]共青团延安市委:《延安时期青年运动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28页。
- [12][27][41]杨延虎 郝琦:《中国青年运动的典范——延安青运十三年》,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79、57、127页。
- [13]郭德宏:《永恒的延安精神》,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52页。
- [14]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79页。

- [16][28][56]《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460、189页。
- [17]《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2页。
- [18][19][20]共青团中央青运史工作指导委员会:《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十三集),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309、309、308页。
- [21]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版,第453页。
- [22]中共中央书记处:《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31页。
- [23]胡献忠:《延安时期党的青年工作述评》,载《中国青年研究》,2012年第11期。
- [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十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29—530页。
- [25][26][43]胡献忠:《中国青年运动一百年(1919—2019)》,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79、181、187页。
- [29]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22年版,第226页。
- [30]《任弼时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7页。
- [31]《绥德国民教育大革新》,载《解放日报》,1944年3月11日。
- [32]《学校和实际密切结合 延安市完小面貌一新》,载《解放日报》,1944年3月21日。
- [33]谭虎娃:《历史的转折——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62页。
- [34][36][4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8、566、568页。
- [35]《加深青年救国会的工作》,载《解放日报》,1941年7月21日。
- [3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8页。
- [38]张远新 吴素霞 张正光:《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56页。
- [39]《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9—90页。
- [4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选集》(第十二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73—474页。
- [44][45]《彭真传》编写组:《彭真年谱(1902—1948)》(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93、293页。
- [46][47][5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71、71、71页。
- [48][50][52][54][55][58]习近平:《论党的青年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154、154、31、40、242、146页。
- [49][53][57]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7、12、9页。

(责任编辑:孔 庚)